

■ 党史研究

“读书会性质的马克思研究会” 与中共历史教育实践

谢辉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012)

摘要:“读书会性质的马克思研究会”是中共革命时期一套重要的理论宣教机制。它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多种名目存在,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的演进历程,最后发展为特定的组织体系。马克思研究会的产生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热潮与中共党内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符合党在理论稚嫩时期大力推进理论教育和宣传的需要,虽然被定位为“公开的学术组织”,但在理论的普及与提高之间更偏重于前者,其工作内容体现出鲜明的历史教育特色。它在党的教育、宣传、统战等工作中发生过重要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历史教育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9)03-0043-07

收稿日期:2019-01-16

作者简介:谢辉元(1988—),男,湖南新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读书会性质的马克思研究会”主要存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形式存在。以往研究在个别考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问题时多有创获,但因未对中共教育宣传工作的相关政策背景予以足够重视,所以也没有揭示出“马克思研究会”的总体状况和演进脉络,以及它与“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内在关系^①。马克思研究会不是纯粹的史学组织,只能算中共领导下开展过唯物史观学习与研究的半学术半政治性团体。它在党的理论宣教工作中扮演了多重角色,这里拟就历史教育一面作重点考察。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出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织性学习和研究在中国的

产生可以追溯至1911年江亢虎在上海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此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众多,而与中共知识分子密切相关并为中共承认为正统组织渊源的,则是1920年3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及1920年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下简称“马研”)。^[1]就前者而言,是在李大钊指导下秘密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团体,活动一年多后才于1921年11月17日刊登启事公开宣告成立,当时的成员有邓中夏、罗章龙、杨人杞(杨东莼)、何孟宏(何孟雄)、刘仁静、高尚德(高君宇)等19人^②。

作为一个“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该会的持续时间达七年以上,会员规模一度达到上百人。其研究方法有四:(一)搜集编译历史类图书。努力收集

^①学界相关研究主要有: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徐素华《中国社会科学联盟史》,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周子信《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史学月刊》1984年第2期;何棠《试论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江西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魏建克《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及历史贡献》,《兰台世界》2014年第13期等。

^②有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研究成果众多,金梦曾对此做过较为全面的梳理,参见《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2期。

翻译国内外研究材料,组建专门图书室,名为“亢慕义斋”(communism)收集有数百部中外文马克思主义书籍,其中有《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唯物史观的光辉著作,还有恽代英译、考茨基著《阶级斗争》,李季译、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等阐释唯物史观的著作,更有基佐的《欧洲文明史》(英文版),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黄郭的《欧战史要》等“历史丛书”。(二)组织讨论会,每周一次,围绕某一主题展开。同时还会举办辩论会。据称该会曾就“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进行公开辩论,参会者是来自北京各校的学生和教员,李大钊最后作结,以唯物史观进行解答,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同时还着重指出工人阶级斗争的必要。(三)组织演讲会,每月一次,敦请名人学者讲演。该会曾于1922年2月19日邀请李大钊到会讲演“马克思经济学说”;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又邀请李大钊、顾孟余、陈启修、高一涵演讲;李大钊还曾编过《唯物史观》的油印讲义,并拿到研究会上开讲。(四)特别研究,由会员自由组合。在会员间先后成立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史、经济史及经济学史、《资本论》研究等11个专题研究组,组员在相应范围内展开学习、讨论^①。

李大钊指导成立的研究会不止一个,1920年12月2日,李大钊、费觉天、梅思平等9个人又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宗旨是“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2]在上海,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杨明斋、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受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相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如1920年,于方舟、韩麟符等在天津,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毛泽东及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都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王右木、恽代英、吴玉章、杨闇公在成都发起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王炳美、邓恩铭等在济南组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在广州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2年赵醒侬、方志

敏等在南昌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等。这些组织团体开展了与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相类似的活动,并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相互促进,传播了唯物史观,将一批批知识青年引上了革命道路,影响深远。以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例,该会所收集的图书资料就曾启迪了许多共产党人。毛泽东在1920年到北京时就曾读到前述提到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著作,并称:这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于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3]前述公开辩论会上李大钊的一席发言使得一位反对社会主义的学生(或谓费觉天)转变了观点,当场表示:李先生发言“一针见血”,“使我们再也无话可说了”。李氏的一番话也同样激起了许多人的兴趣,此后不久,参加研究会的人员激增,北京各校也成立了类似团体。^[4]

二、理论学习活动的规范化

中共成立后不久,设法对国内蓬勃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宣教活动予以引导和规范,遂出台了党内文件,要求各地党组织有系统地组建马克思研究会,在确定其读书会性质的同时,还划定了组织范围、学习内容和负责单位。1923年冬,中共中央向各地党组织颁发了《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其中明确规定“各地方至少当组织读书会性质的马克思研究会(表面上可取任何名目)。同时可以吸收非同志。此等读书会由地方教育宣传委员组织之。读书会根本材料可用函授部之讲义。”^{[5]28}读书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了这个组织的内在宗旨和活动形式,而名目任取则增强了组织的灵活性,这实际上也是对“社会科学研究会”“社会问题研究会”等多样活动形式的承认和鼓励。可以吸收“非同志”,则扩大了团体的群众基础,使它有可能为党组织培养后备军,或者成为统战工作的重要形式。地方教育宣传委员会即各地党的宣传部门,是研究会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研究会的学习材料,即函授部编写的四种讲义:经济学及社会进化史;社会学及唯物史观;社会思想及运动史;社会问题;国

^①以上参见《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17日、6日,第4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三)》,《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2日,第4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6日,第4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五)》,《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17日,第4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特别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3月22日,第4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5月3日,第4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征求会员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13日,第3版;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8页-121页;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8页-194页。

际政治及帝国主义。^{[5]26}其中与历史有关的就占三种,足见当时中共中央对党员唯物史观素养培育的高度重视。

另外,该组织法还要求各地教育宣传委员会对读书会的成绩作出详细汇报,汇报内容要求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一月内开会讨论次数。(二)会员多少(比上月之增减数目)?(三)开讨论会到者多少人?(四)会员中同志与非同志数目之对比,及两方人数比上月之增减。(五)到讨论会之同志与非同志数目之对比【比】及两方人数比上月之增减。(六)一月中读书会各会员所读何书?(七)此月内所读完之书有几种?(八)所讨论者为哪种问题争点在何处?(九)若所讨论之问题有关于函授部讲义则是否有因此而向函授部发出公共疑问?何种疑问?是否在本地方读书会中此等问题即已解决,如何解决。大凡此等读书会之讨论必须先有一至二人预备“报告”,此等主要报告人之意见大体如何,反对者意见又如何,其结果如何?^{[5]28}

这些细致的规定表现出中共高层特别注重对基层党员或非党员思想动态的把握,体现了他们希望对此及时作出反馈、进行沟通和给予引导的意图,从而也反映出早期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所具有的知识分子气息。不仅如此,文件还对读书会的举办流程提出了建议“此等读书会之组织,最好每人认定函授部某几种讲义以为根据,再自由参考他书,则每月或每两星期开讨论会,必能有人预备主要报告,报告题目可在一星期前通知各会员。”^{[5]28}这是以相当多的活动经验为基础的建议,为各地马克思研究会工作的开展给出了提示。总之,上述一系列规定无异于确立了一套党内学习研究制度,其主体是希望通过阅读经典、组织讨论来启发思想觉悟,提高理论水平,解决革命难题。而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与唯物史观分析工具的掌握,又是中共高层所看重的、所有党员所必须肩负的学习和研究任务。

三、新兴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兴起

在中共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如上海、广州、北京、开封、宁波、南京、安庆、芜湖等)兴起了各种类型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以下简称“社研”),这实际是一种“读书会性质的马克思研究会”。它们有

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避免官厅注意易名而来,如安庆、芜湖“社研”即是如此。^[6]“社研”契合了当时兴起的社会科学研究潮流和高压文化政策下的隐蔽需要。其时马克思主义也假“新兴社会科学”或“现代社会学”之名流行,故两类研究会名称虽异,但实质与内容相同。“社研”多以青年知识分子为吸纳对象,以高校或中学为依托,占有一定的学术资源,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都较具优势。如国民革命时期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和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就是其中典型,它们处在国民革命运动的两大中心上海和广州,以两所高校为依托平台,借助校内外的各种激进或左翼学术资源展开活动,因而取得了不小成就。

上海大学在1923年夏天设立社会学系,系主任先后为瞿秋白、施存统、彭述之,教学活动呈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点。社会学系是上海大学人数最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最多的系。系中学生积极开展社团活动,很快便在中共指导下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①。该会作为公开团体出现,无论党员、非党员都可入会,读书报告、讨论会和公开演讲是该会的经常性活动。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杨贤江等上海大学教员也都曾被研究会聘为指导员,指导该会的学习、研究工作。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许多工作都是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举办讲座就是一例。1923年11月8日,在中共上海区委第21次会议上,瞿秋白等曾指出应当通盘筹划“教育宣传问题”,对于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演讲活动,需要指定演讲人及其题旨,当场确定的演讲人及其讲题有:施存统(社会思想史)、蔡和森、邵力子、刘仁静(现代政治)、刘仁静、卜士畸、恽代英、瞿秋白、施存统(主义)、王荷波、罗章龙、邓中夏(劳动运动)、向警予、沈雁冰(妇女问题)。^[7]该会举办的演讲向社会公开,为了扩大影响,还经常在《民国日报》上刊登演讲信息。1925年4月18日,杨杏佛应邀到会作“从社会方面观察中国政治之前途”的演讲,这次讲演就曾登报宣传。^[8]3天后,恽代英也受邀到会作了持续一周的“中国民生问题”讲演。该会还准备让会员为恽代英做好笔记,以备将来修正出版。^[9]不仅如此,演讲笔记有时也被登报分享。

^①关于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成立的具体时间有待确考。一种可能是成立于1923年下半年,相关材料显示,至少在这一年11月1日,该系社会科学研究会即已成立,因为当天中共上海区委第20次会议决定11月7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开会,以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参见刘小中,丁言模《瞿秋白年谱详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另一种可能则是在1924年12月,当月30日的《民国日报·觉悟》登载了余泽鸿有关瞿秋白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的笔记,笔记中提到了庆祝研究会今天成立的话。(参见《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会》,《民国日报》1924年12月30日)。笔记形成时间应该是在12月30日前,从报纸新闻强调时效性来看,该报发表的较有可能是近期形成的新笔记,而非保存下来的旧笔记。

恽代英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作“我的社会科学方法”的演讲笔记就曾于1924年12月29日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10]瞿秋白有关《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演讲于次日刊载,他在这次演讲中强调了社会科学是研究全人类的关系,应当用根本改造而非一时救济的方法解决社会贫富不均,要以阶级利益去观察社会制度的演变,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分析书本和现实材料。^[11]此外,吴玉章、郭沫若等社会名流也曾受邀到会讲学。据称,当时在上海大学学习的李硕勋、赵君陶等人就加入了研究会,并积极参加吴玉章、郭沫若等人的讲座。研究会作为中共党团组织指导下的学生研究团体,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研究会活动坚持到1926年上半年,因其时会员“难能召集”,“少人确实负责”而无法持续,上海大学共青团特别支部在工作报告中也惋惜道:“(研究会)在过去的学期中,可以说死了!”^[13]

1926年12月24日,中共广东省委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组织中山大学进步学生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该会受中共中山大学总支委会领导,以“研究社会科学知识”为旨趣,在成立大会上选出欧阳继统、何思源、毕磊等9人为干事。^[14]⁴⁰这9人中共产党员有好几个,接近以戴季陶、朱家骅为核心的校方的只有何思源。^[15]²³³对该会负有实际领导责任的为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①副书记的中大学生毕磊,欧阳继统则处理日常事务。曾济宽、何畏、何思源三位校内教授为该会指导员。^[14]⁴¹该会是开放性组织,成员包括以中山大学党团员为核心的广州大中学校进步学生200余人。研究会下设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问题、国际问题等讨论组,会员在其中积极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16]该会还曾积极邀请名流学者到会演讲,经济学者何思源就曾受邀开讲《社会科学研究法》,何氏本人指出,其讲稿是他在柏林大学上学时有关计划经济研究的成果,讲演完后稿件还进行了出版和重印。^[15]²³³据《鲁迅日记》记载,1927年1月27日,鲁迅也曾受邀到研究会演说,演说内容无从确考,但从他在山大文史科讲授文学史、小说史、文字变迁史等课程来看,演讲内容很有可能与文史有关。鲁迅此后对研究会的工作大力支持,每月

捐助10元作为该会学习活动费。^[14]⁴⁰此外,陈延年、萧楚女、陆一远、阮啸仙、李求实等都曾来校作过报告。而该会的学习活动也非常生动活泼,每一讲后都展开激烈辩论,有关问题的论战还常常以在学生宿舍走廊张贴壁报的形式进行,据称鲁迅由于对这种壁报很感兴趣,有时还特地跑去看,兴起之时会留连较久。^[17]该会持续时间不及半年,却办得有声有色,还编有富于史料价值的《中国共产党底历史与策略》的报告。随着毕磊等人在“四·一二”事变中被捕杀害,该会活动也戛然而止。

四、国统区与苏区:两套系统的确立

1927年以后国共内战的环境下,国统区和苏区形成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两套不同的马克思研究会系统。在国统区,由于中共党组织转入地下,社会科学研究会作为一种半公开的活动形式,受到中共地方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格外青睐。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对此进行了鼓励和引导,指出“为适应目前群众对于政治与社会科学的兴趣,党必须有计划的充分利用群众的宣传组织与刊物,以求公开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党应当“参加或帮助建立”社会科学研究会。^[18]这就为社会科学研究会在全国更为普遍地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而作为结果,上海“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1930年),北京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会”(1930年),广州中山大学的“新兴(社会科学)读书会”(1932年),中国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会”(1933年)等组织先后成立。留日学生1929、1935年也在东京成立过“社会科学研究会”^②。上海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是其中较为典型者。

1930年冬,在上海各校学生组织的“问学社”“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步社团的基础上,由“中国社会科学联合会”领导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以下分别简称“社联”“社研”)。社研的行政和党团领导是一个班子,成员有王学文、朱理治、陈孤凤,而以王学文为党团书记,此后曹荻秋、韩托夫、许涤新等都曾出任过该职。社研支部中的党团员接受区委领导。社研虽是独立于社联之外的革命文化团体,但在具体活动上却受社联的指导,后者还派出林伯修(杜国庠)、张如心、潘梓年、刘芝明、熊得山组成指导社研的专门支部,社研的很多活动经费也

^①学委书记为恽代英,委员有萧楚女、徐文雅(徐彬如),他们也都曾在中山大学任教。

^②参见江伯玉《回忆二弟江隆基》,载《西乡县文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西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版,第201页;王子光《忆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简况》,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0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是社联赞助的。社研具有较为完善的组织机构,内分为总务部、组织部、宣传部、研究部、发行部,成员最多时达1000多人,还在各地成立了数十个分会,其中就有东京、无锡、苏州分会。社研的基层组织分学校支部和街道支部两种,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夏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法政学院、上海中学等大中学校,以及中共自己创办的文艺暑期补习班、现代学艺研究所、浦江中学等教育机构都曾建有社研支部;街道支部则多是社会进步青年。部分日本学生也曾参加过社研活动。社研活动同样包括召开读书讨论会、组织演讲等内容。有亲历者称,社研的读书会每周举办,学习内容包括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革命史。学习过的书籍有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等。学习方法则是大家事先准备,预定一人作主发言,然后展开讨论。至于公开或内部演讲,更是因有社联的支持而搞得极有声色。上海社研与其他革命文化团体在“中国文总”的领导下实现了强有力的统一行动,加上受党内外斗争形势的影响,其成员经常参与革命实践活动,如开展工人罢工的募捐救济,对被捕者实施援救,举行游行示威集会,发传单,写标语等,这是这一时期社研工作的重要特色。到1933年6月,为充实社联力量,社研与社联合并为“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社研宣告结束。上海社研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培养出一批党内理论干部,如劳动大学的许涤新、马纯古、丁冬放,法政学院的邓拓,复旦大学的陈正飞,中国公学的杨超,法租界街道支部的江隆基等,都成长为为中国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理论工作者或实践家。就是当时参与社研的著名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安斋库治后来也表示:当时学习的马列主义,吸引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使他终身难忘^①。

另一面,在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则形成了从上到下的组织体系,它对干部历史学习和研究起到动员和组织作用。1933年1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长的张闻天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由于他重视且熟悉理论工作,遂借鉴国统区工作经验,藉马克思诞辰50周年之机,于是年2月促成中共中央起草纪念决议,责成各地各组织在群众纪念大会上倡议“成立各种公开的学术组织(如社

会科学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各级党部须派得力同志参加,传达党的影响”。^[19]4月,张闻天到中央党校演讲,提议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得与会者响应并选为理事会书记。该会后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8月,中共中央又致信各级党部,指出:中央到省县一级机关内“应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领导之下,经常有系统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讨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20]214};同时还规定了学习任务,即每周上课(或讨论)一次,半年内要学完三个科目,第一个半年要学完包括俄国党史与列宁主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三科;研究会有学习任务,但也必须进行详细研究;研究会以列宁室为附属组织,组织理论水平较低的干部的学习工作。^{[20]215}在此前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江西分会、中央局分会、红军分会,乃至基层组织的各级研究分会纷纷成立^②。而中共中央也责成成仿吾、张如心制定了研究会的组织和工作大纲。《大纲》指出,研究会成立的目的是“加强一般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准备,造成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同时运用列宁室、俱乐部等机关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线”。^{[20]217}入会资格上,党内外人员有最低程度的文化水平(如能看《红色中华》和《青年实话》的),愿意在理论上深造,并有时间参加研究的,经会员一人介绍即可参会。组织机构上,研究会以“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总会”为最高领导机关,总会成立理事会,并选出常委。总会下设组织部、研究部、编辑部。各地有10人以上可以组成分会。^{[20]218}各分会成立高级班与初级班,班内设小组和专门研究组。研究方法上,由理事会提供大纲或参考材料,会员据此详细研究,再在会上讨论。^{[20]219}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研究内容,涵盖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俄国党史、中国革命经验(即中共党史)等内容。研究会也不时举办演讲会,张闻天受邀讲过《广州公社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朱德讲过《南昌暴动》,董必武讲过《巴黎公社》,博古讲过《十月革命的经验与教训》,都与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有关。在研究会的影响下,《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著作先后出版,尤其是后两部著作,分别是张闻天有关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革命运

^①以上内容参见王学文的《关于社联和社研》、《回忆社会科学研究会》和孙克定的《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会》,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成立55周年纪念专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页-197页。

^②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江西分会成立了》,《红色中华》第89期,1933年6月29日;《中央局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分会》,《红色中华》第107期,1933年9月3日。

动史的重要论述,有着较高的理论价值。

五、革命环境下的理论宣教体制

到抗日战争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取得阶段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成为党内教育的重中之重,“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这种着眼于理论普及又过于学院化的“学术组织”,未能继续赢得中共高层的足够重视,因而无法像此前那样发展出普遍性的组织系统。不过基于宣传需要,在国共合作环境下,“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组织模式仍然得到延续,在边区和国统区都偶有成立。如陕甘宁边区就存在过“社研”,其中较为活跃的成员有吴亮平、何干之、陈昌浩、陈伯达、徐懋庸、杨松、徐冰、苏华、杜民、刘芝明、涂国林等,他们曾以“社研”名义集体编著了一些社会科学作品,如《社会科学基础教程》(1938年)、《社会科学概论》(1938年)、《马列主义研究提纲》(1941年)等。而杨秀峰等人1941年也曾在晋冀鲁豫边区组成太行社会科学研究会。^[21]

“社研”的研究模式之所以能比“马研”更加风行,除了中共中央的大力提倡外,更因为它乘上了社会科学传播热潮的东风,能够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提供合法的外衣。在这股东风之下,不仅中共方面,社会上其他团体也会自行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如1928年中央大学区立上海中学也曾组建社会科学研究会,邀请何炳松讲史学^[22],而直到1947年,陶希圣、邵鹤亭、陈钟浩等还曾在南京发起创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23],他们的活动内容与中共影响下的研究会有着天壤之别。与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比较,中共领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因有着组织支持,所以在规模和社会影响力上要大得多,而其学术性也淡得多,虽名为“研究会”,实际上更像是“读书会”“学习会”。其学习重点则在马列理论、唯物史观教育与历史教育在其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社研”在本质上终究没有脱离中共中央所提及的“读书会性质的马克思研究会”范畴,它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一样,成为中共开展理论教育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它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展党的理论教育(其中包括历史教育),促进了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升,丰富了其历史唯物主义认知,在社会发展史、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知识的普及上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在社会发展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上催生出一些学术成果;三是起到了宣

传和统战的历史作用,吸引了一批批知识青年加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大潮中,并最终引导他们走向革命队伍,其影响甚至延伸到国际上。

马克思研究会的发展趋势与其本身所具有的特色息息相关。首先,它的产生、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加强理论教育和研究的需要相契合。它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的演进历程,最后发展出特定的组织体系,实际也是党内政策引导的必然结果。它符合党在理论稚嫩时期大力推进全党理论教育和宣传的需要,虽然被定位为“公开的学术组织”,但在理论的普及与提高之间更偏重于前者。不过与各类形式的训练班、读书班和根据地学校相比,它在理论的提高上显然有着更高的追求。而与延安时期其他专门的学术研究组织,如1937年张闻天领导下成立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会”,1938年毛泽东倡导成立的“新哲学学会”等相比,在理论提高的效用上有不及。所以“马研”和“社研”多在有一定知识基础的进步青年和学生间发展,少数成立于学者间的组织也是致力于理论教育或统战工作。其次,它是由知识分子气息较重的党内领袖推动发展的。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普遍发展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党内知识分子领袖的指导有关,国民革命时期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人对新兴社会科学研究会也有过重要支持,国共十年内战时期张闻天、王学文、张如心、潘梓年等对苏区和国统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体系的确立起过重要的推进作用。再次,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与学习的热潮中发展起来的。“五四”和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出现与唯物史观的早期传入,国民革命时期新兴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出现与唯物史观社会学的引进,国共十年内战前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普遍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风行,都有着直接联系,研究会的创建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比较热烈的地域和时段内展开的。最后,就历史教育而言,马克思研究会的学习内容在逐渐走向深化。“五四”和建党时期马克思研究会注重的是唯物史观的学习,后来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社会进化史,再后来又增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党史,历史教育的内容在逐渐走向深入和具体。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环境下创建的一套特殊的理论宣教体制,历史学习和研究是其工作的重要内容。它为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开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

-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60.
- [2]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通告 [N]. 北京大学日刊, 1920 - 12 - 04.
- [3] [美] 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 [M]. 董乐山,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 131.
- [4]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 “一大”前后(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120 - 121.
- [5] 中共中央组织部. 等.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文献选编(上): 第8卷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 [6]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徽省志·社会科学志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9: 4.
- [7] 刘小中, 丁言模. 瞿秋白年谱详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135.
- [8] 杨杏佛今日演讲 [N]. 民国日报, 1925 - 04 - 18.
- [9] 黄美真. 上海大学史料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98.
- [10] 我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N]. 民国日报, 1924 - 12 - 29.
- [11] 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会 [N]. 民国日报, 1924 - 12 - 30.
- [12] 张祥珍. 松柏精神留人间——赵君陶传略 [C]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酉阳文史资料选辑: 第14辑. 内部发行, 1992: 3.
- [13] 中央档案馆, 上海市档案馆. 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 1925 - 1927) [M]. 上海: 上海市档案馆, 1987: 356 - 357.
- [14] 朱金顺. 鲁迅演讲资料钩沉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 [15] 何思源. 回忆鲁迅在中山大学情况 [C] // 鲁迅研究资料编辑部. 鲁迅研究资料: 3.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9.
- [16] 胡华.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16卷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110 - 111.
- [17] 沈鹏年. 鲁迅在广州时期的若干史实(续) [N]. 光明日报, 1961 - 09 - 22.
- [18]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5册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267.
- [19] 中央关于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的决议(1933年2月17日) [J]. 红旗周报, 1933(58): 12.
- [20] 陈元晖. 等.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
- [21] 皇甫束玉. 等.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9: 206.
- [22] 上海中学举行演讲会 [N]. 申报·教育消息, 1928 - 11 - 27.
- [23] 首都学术界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 [N]. 大公报·教育与体育, 1947 - 03 - 27.

[责任编辑 齐文娟]

“Marx Research Association with the Nature of Reading Club” and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Edu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E Hui-yuan

(Institute of History The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Abstract “Marx Research Association with the nature of reading club” is an important internal party education mechanism during the CPC revolutionary period. It exists in various names such as “Marxism Research Association”, “Socialist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ssociation”. It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evolution from spontaneous to conscious and finally developed a specific organizational system.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x Research Associ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Marxist communication boom and the CPC’s internal policies. It is in line with the party’s need to vigorously promote theoretical education and propaganda in the immature period of the theory. Although Marx Research Association is positioned as an “open academic organization”, it is more focused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ory than on improvement, and its work content reflects the distinctive historical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Marx Research Associat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rty’s education, propaganda, and united front work.

Key Words: Marx Research Association; Marxism Research Association; Socialist Research Associat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ssociation; historical education